

## 赵世炎给黄仲苏的明信片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旅欧时期曾写给黄仲苏一张明信片，当中不仅简述了自己的近况，还处处显露出与这位好朋友的情谊。书写这张明信片时，二人还是笔友，直到赵世炎写完这张明信片后几天两人才得以相见。

赵世炎1901年生于四川西阳县，14岁时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并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1919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5月，赵世炎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赵世炎与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中央执委会书记、中共旅欧支部委员、中共法国组书记。

黄仲苏生于安徽舒城，1918年与李大钊等人组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也因此与赵世炎有了交集。1922年初，他到法国巴黎大学读研究生。这一时期，他与同在法国的赵世炎时有联系。在这张明信片中，赵世炎写道：

仲苏兄，

请你恕我现在不能给你写信，纵然我是十分想给你写……

你们南下我猜的三事，既然都说对了，你们又不从详告诉我，只说了一句“非面谈不可”，真弄得我心痒难禁！……

这张明信片写于1922年4月28日，从中可看到，赵世炎非常想念黄仲苏等一众来法的同窗好友。几日后，两人终于得见，长期依靠通信联络的两人，友谊更上了一层楼。黄仲苏在《怀念赵世炎同志》中提道：

1922年5月第一个星期日，在巴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五四

## 见证战友情的革命文物

·李琮·

纪念聚餐会上，我初次遇见了赵世炎同志……他精力充沛，神态安定，给人一种愉快的印象，好像具有吸引力，使人一见对他就产生好感，愿意和他接近。

1924年，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赵世炎应李大钊要求回到北京工作，一年后他多次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得知赵世炎去世后的黄仲苏非常悲痛，他多次撰文怀念这位少年中国学会及留法时期的老战友。在《赵世炎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情况》中，黄仲苏说：

……赵世炎曾向我提及李大钊对他的关注：“李先生可算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引路人，我来巴黎参加勤工俭学运动完全是由于他的鼓励和赞助。他要我把劳动和学习打成一片；把法国工人当教师，向他们学习语言、技术和工艺，也研究他们的世界观……”

黄仲苏说，“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说来，李大钊对赵世炎所进行的指导便是个最具体最生动的实例”。

## 何叔衡送给林伯渠的毛衣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五位年龄较大、德高望重的同志，有人亲切地称他们为“五老”，分别是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五老”之间革命友谊

深厚，何叔衡与林伯渠的战友情尤令人称道。

何、林二人都来自湖南，是地道的“老乡”，又共同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并一起回国，有着共同的革命经历。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何叔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院主席等职，在叶坪办公；林伯渠则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后担任财政部长，在沙坝办公。两人感情很好，经常促膝长谈。

1934年10月长征临行前，“五老”原本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特别是年龄最长的何叔衡，更是准备好了长征用的草鞋。但最后上级决定何叔衡留在中央苏区，其他几位老同志则随红军西行。部队出发前一天晚上，何叔衡准备了一些酒和花生，为林伯渠送行。他们长谈至深夜，临别时，何叔衡将身上穿着的毛衣脱下，送给林伯渠作为纪念。这件毛衣是何叔衡从上海来苏区前，他的女儿连夜赶工织成。林伯渠百感交集，当夜写就《别梅坑》诗一首：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尊喜对倾。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绶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这一晚，是两位老人的最后一别。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上杭水口战斗中牺牲。林



1941年，毛泽东（右一）在延安看望病员后合影。右三为傅连璋

伯渠则随长征队伍一直北上，最终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这件毛衣，林伯渠后来一直保存完好。1960年林伯渠去世，次年2月，其夫人朱明将这件毛衣捐给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

## 毛泽东送给傅连璋的棉被

傅连璋1894年生于福建长汀，毕业于汀州福音医院的亚盛顿医馆，后被聘为长汀福音医院医生，1925年后担任院长。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路过长汀，傅连璋收留了部队中一大批伤员，亲自为他们治疗。慢慢地，他成了革命一分子。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傅连璋又接收了红四军的伤号病号，并向朱德建议为红四军种牛痘疫苗。他还将订阅的《申报》等想方设法转交给毛泽东，并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为党、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和傅连璋之间深厚的情谊，要从1932年算起。当年秋天，毛泽东去长汀看望刚分娩没多久的贺子珍，同时也留下在

福音医院养伤，在这里，他得到傅连璋的悉心照顾。傅连璋是个基督徒，毛泽东通过对他的不断了解，帮助他分析参加革命的思想原因：“你是受压迫阶级出身”。傅连璋从此没有了顾虑和担心，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1933年，傅连璋响应毛泽东号召，将福音医院搬到瑞金。在瑞金，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家正规医院——中央红色医院。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关头，毛泽东在于都患了重病，傅连璋听说后，日夜兼程从瑞金赶过来。经过他的“出诊”，断定毛泽东患的是恶性疟疾，他只用四天时间，就帮助毛泽东恢复了健康。毛泽东称傅连璋为“红色华佗”，他说：

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他在我们工农红军中是一位深得人们尊敬、爱戴的名医啊！

1934年10月，傅连璋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傅连璋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让部队注意饮食、不喝生水、防止叮咬，一路上他用精湛的技艺保证了红军指战员的健康和安全。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保安县。傅连璋和夫人陈真仁当晚就住在毛泽东家。第二天，贺子珍特地让中央政府总务处与黄祖炎送来一床棉被。一床普通的棉被，背后是毛泽东与傅连璋真挚的革命友谊。中国革命博物馆成立后，陈真仁将这床有着重要意义的棉被捐赠出来，它成为革命战争年代战友情的见证。（摘自《百年潮》2023年第5期）

## 美国的恐慌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堪称石破天惊。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整个自由世界掀起了一股恐惧的浪潮。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的评论员，连同大街上的公众，异口同声地说，这表明在一场大规模的科学竞争中，苏联已打败了美国……公众如此强烈的反应令我感到吃惊。

一周之后的10月13日，号称“美国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是美国遭受的又一次灾难性的珍珠港袭击，它代表了美国军事科技的全面失败。”

艾森豪威尔虽是军人出身，却不喜欢战争，他信奉一种被称为“大平衡”的理论：美国应该减少军费，将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他曾表示：“难道非要我们大多数人民勒紧裤带，忍受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来承担如此庞大的国防开支吗？”而艾森豪威尔的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则号称“害怕财政赤字甚于害怕共产主义”。

这时艾森豪威尔仍想挽救

## 美为何提出阿波罗登月计划

·江晓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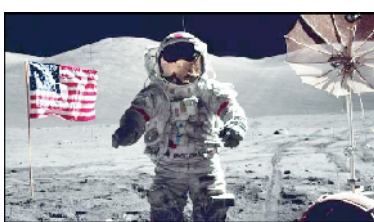
他的“大平衡”理念，1958年3月26日他让国务院发布了宣传手册《外空入门》，艾森豪威尔还为手册写了序。手册中说：

科学家和社会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人类生存的地球尚有诸多未知问题亟待研究，为什么我们要将目光投向宇宙？

当时美国有一种普遍的恐慌认为，既然苏联的人造卫星一直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那苏联人从卫星上向美国投放炸弹怎么办？宣传手册针对这一恐慌，还特别科普了一个问题：从绕地球飞行的人造卫星向地球投放炸弹是不可能的，因为“物体从卫星中被释放后根本不会下落，无法射向目标”。

## 苏联阵营发明的逻辑

似乎要对美国人关于从人造卫星上扔炸弹的恐惧火上浇油，苏联国际期刊《新时代》上公布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经过世界60个重要城市上空的具体时刻，这些城市中包括“自由世界”的纽约、华盛顿、伦敦、巴



1969年，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登上月球

黎、东京，此外还有莫斯科、北京和上海。

人造卫星发射两天之后，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

苏联科学……获得了世界科学的首位，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社会制度像社会主义制度这样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而赫鲁晓夫在1957年11月22日对美国记者表示：“现在威胁你们的不是洲际弹道火箭，而是和平进攻，是在生产消费品和改善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方面的和平竞赛。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这个竞赛将会表明到底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优越。”

195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186篇关于苏联人造卫

星的评论和社论，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表达了同样的逻辑思维：苏联人造卫星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工业力量迅速壮大。

“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奇妙的是，苏联阵营建构的“科学发达说明社会制度优越”的逻辑，被当时冷战双方都接受了。所以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也被美国政客用来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空政策。

艾森豪威尔本来不赞成和苏联阵营搞军备竞赛，他的“大平衡”主张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这应该是全球发展的正道。但他的政敌，比如当时的肯尼迪等人，一直不赞同艾森豪威尔的主张，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让他们拿到了一张王牌，使他们得以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事政策和外空政策发起有力的攻击。

在这种攻击中，他们经常拿

“国家安全”来说事。在他们看来，苏联在人造卫星方面的技术领先，极大地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肯尼迪方面的观点最终还是占了上风，随着他当选总统，恰好又遇到苏联宇宙飞船载人上天的刺激（1961年4月12日），肯尼迪急切地表示：“如果有人能告诉我如何赶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很快就有人告诉肯尼迪如何赶上去了，办法是两步棋：

一是开启大规模军备竞赛。肯尼迪坚持认为，安全只存在于更多的核弹头和更多的远程弹道导弹。”他的这个幼稚想法，至今仍被许多美国政治家奉为圭臬。

二是搞出一个比苏联人造卫星和加加林上天难度更大的航天行动，来证明美国的科学技术比苏联的更先进。阿波罗登月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这个工程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政治工程，而不是许多普及读物中经常渲染的“科学探索”行动。它的目的就是来证明美国的科学技术比苏联的更先进，从而证明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比苏联的更优越。（摘自6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